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4.06.09

# 市场化转型成效取决于“初始条件” 还是“路径选择”？\*

——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中苏比较研究

隋福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摘要:**中国和苏联的市场化转型走了不同的道路,经济绩效也有很大不同,转型成效的差别主要是因为转型的“初始条件”不同,还是由于选择的转型路径和政策不同?基于“后发优势”理论,采用反事实分析架构,对中苏转型“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战略及所形成的结构和体制上看,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有很多相似之处,“初始条件”区别并不大,苏联与中国一样具有“后发优势”,而且苏联具有更好的“后发优势”实现条件,但是苏联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后发优势”。因此,市场化转型的成效并不主要取决于转型的“初始条件”,而主要取决于转型的“路径选择”;中国市场化转型的成功,应该主要归因于选择了正确的转型道路和适宜的改革政策。

**关键词:**市场化转型;后发优势;初始条件;转型路径;路径选择;改革政策,中苏比较;渐进式改革;休克疗法

中图分类号:F061.3;F0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6-0069-12

## 一、引言

20 世纪最后 30 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一个是苏联解体。中国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但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了市场化方向上的改革,改革的绩效明显,从 1978 以来经济一直持续增长,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sup>①</sup>。而苏联则通过“休克疗法”完成了由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但成本很高,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但其经济实力已经大为逊色(表 1)。当然,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快于俄罗斯,但俄罗斯的人均 GDP 还是高于中国<sup>②</sup>(图 1)。

\* 收稿日期:2014-09-03;修回日期:2014-10-08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比较研究”

致 谢:感谢在“中俄经济发展比较研究”小型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也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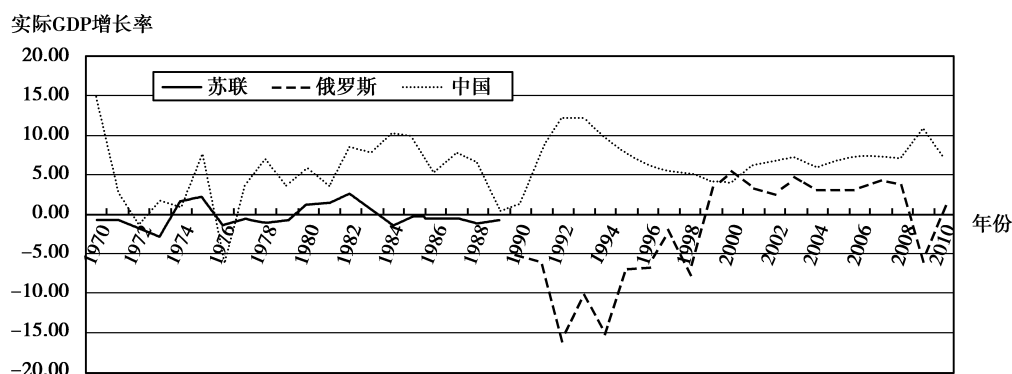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隋福民(1972—),男,辽宁阜新人;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E-mail:suifm@cass.org.cn。

<sup>①</sup>当然,有些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是成功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渐进策略虽然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绩效,但长期来看,这种绩效或许还是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参见杨小凯、张维迎等学者的观点。

<sup>②</sup>根据 IMF 数据,2013 年俄罗斯的人均 GDP 为 15 650 美元,而中国为 6 629 美元。

表 1 中国和苏联的市场化转型比较

	中国	苏联
转型时期	1978—	1990—
经济改革/转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政治改革/转型	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从中央集权体制向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转型
制度转型	显著	显著
转型策略	渐进(试验)	激进(休克疗法)
转型绩效	GDP 不断增长,2013 年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GDP 下滑、波动、增长,2013 年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
人民生活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生活水平有下降过程,然后逐步恢复



数据来源:ERS/USDA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Data Set

图 1 中国和苏联(俄罗斯)GDP 增长率比较

为什么中国和苏联的市场化转型会有如此大的表现差距?<sup>①</sup>是政府实施的政策(即转型路径的选择)使然?还是“初始条件”不同?对此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渐进改革策略”是中国市场化转型成功的关键。比如,罗澜(2012)认为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差别不是很大,如果说二者的“初始条件”不同,那也是中国的“初始条件”更差一些;中国能够取得成功完全得益于政策,因为中国在政策选择上没有听从国际组织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家的建议,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自主抉择,“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获得了成功。但也有人把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其落后的“初始条件”。比如,Suchs 和 Woo(1994)认为中国的成功缘

于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大量的农村人口、深厚的封建主义历史传统以及深受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影响的劣势,而苏联的失败则在于过度工业化、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或者更为保守的共产党;而且,他们还给出了富有逻辑的说明:“既不是渐进,也不是实验,而是中国经济结构,才被证明是对改革成功最贴切的解释。中国改革是从农业社会开始的,而苏东是从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开始的……用 Gerschenkron 的语言来说,中国具有‘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来

<sup>①</sup> 这里的“转型”指的是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从用计划经济手段向用市场经济手段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个别或者局部调整不属于本文所指的转型范畴。以此观之,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为市场化转型,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社会剧变也是市场化转型,但两者的转型路径有本质区别。

进行技术创新,其技术变迁成本就会远低于发达国家,进而推动快速技术变迁;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的回报率就会有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与此同时,技术的快速变迁,还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进而可以共同导致后发国家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林毅夫,2003)。当然,“后发优势”还体现在后发国家在制度、经验上向发达国家的学习等方面<sup>①</sup>。总之,“后发优势”理论为后发展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撑,很多学者也用“后发优势”来解释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并不否认“后发优势”理论的适宜性,但问题是,中国市场化转型的成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是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在此,我们尝试通过对中国与苏联市场化转型的比较来探究中国转型成功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框架采用“反事实分析架构”(counterfactual framework),“反事实分析架构”是因果推断中的一种思路。按照“反事实”的逻辑,要分析中国转型的成功是否归因于渐进式改革的路径

选择,我们需要知道两种状态:一个是中国实施了渐进性改革政策的状态,即我们所知道的状态;另一个是中国没有实施这种政策的状态,这个状态我们不知道,即该结果是“潜在”的。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苏联作为中国没有实施这一政策的“潜在结果”。但问题是中国与苏联的“初始条件”不同,即“基线变量”不同,如果要得到“路径(政策)选择”(即“某种处理”)对于转型结果(也就是因变量)的影响,需要将“初始条件”控制住,即通过一些办法让两者的“初始条件”基本一致。但是,国家与国家的不同体现在多方面,我们如何进行“初始条件”的比较呢?“后发优势”理论比较强调“初始条件”<sup>②</sup>,并且认为“初始条件”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较大。因此,我们引入“后发优势”理论,提取出一些经济指标作为“初始条件”进行比较。如果能够确定中国的“初始条件”与苏联具有相似性,或者说从“后发优势”的角度讲中国的“初始条件”还不如苏联,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其所选择的转型路径和改革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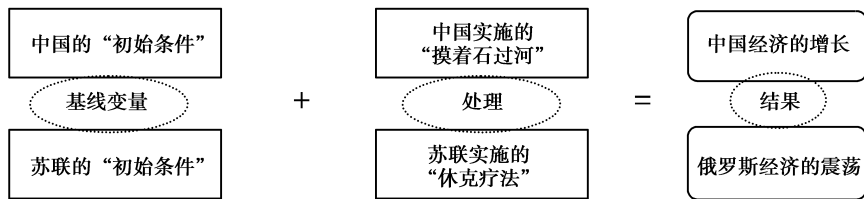


图2 本文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析认为,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确实有一些不同,包括人均GDP水平等,但是从工业化的历史、战略及所形成的体制及经济结构上看,二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确实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而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也并非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苏联与中国一样具有“后发优势”,而且苏联具有更好的实现“后发优势”的条件,但是苏联的转型绩效表明,苏联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后发优势”,其原因在于“路径选

择”,而不是“初始条件”。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说明中国和苏联同样具有“后发优势”;第三部分论证中国在“后发优势”的实现条件上不如苏联;最后部分从世界视域论述市场化转型“路径选择”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的转型成功应该主要归因于正确的转型路径和改革政策。

## 二、中国与苏联“后发优势”潜力比较

中国和苏联的“后发优势”潜力有很大差别吗?

<sup>①</sup> 如 Levy 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在认识、技术借鉴、预测等方面具有“后发优势”;樊纲认为后发展国家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技术、知识和经验,也能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借鉴经验和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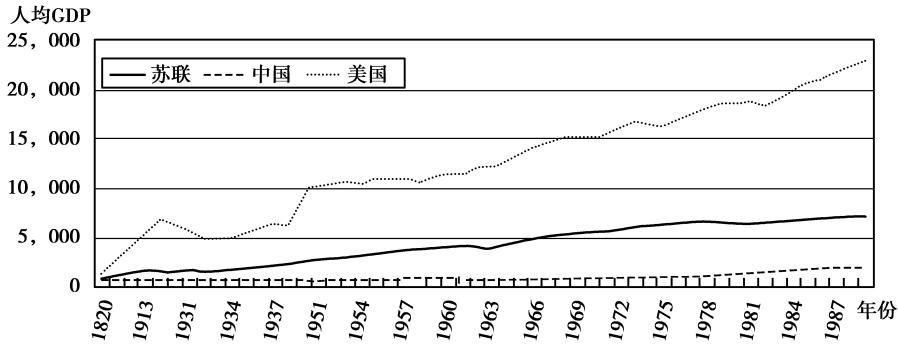
<sup>②</sup> 这里的“初始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即其“后发优势”的潜力;二是影响后发国家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绩效的各种因素,如社会能力、经济环境等,即其“后发优势”的实现条件。

我们分析的结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以美国为例），中国确实具有“后发优势”，但苏联同样具有“后发优势”。

### 1. 人均 GDP 比较

人均 GDP 是衡量“后发优势”的较好指标<sup>①</sup>。根据 Maddison 的数据，中国与苏联的人均 GDP 有一定的差距，如 198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为 1 061 美元，而苏联为 6 427 美元。但与此同时，两个国家都与美国（我们以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从土地面积、经济总量、人口等指标看，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同属于大国）相差较大，1980 年美国的人均 GDP 为 18 577 美元。1989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1 834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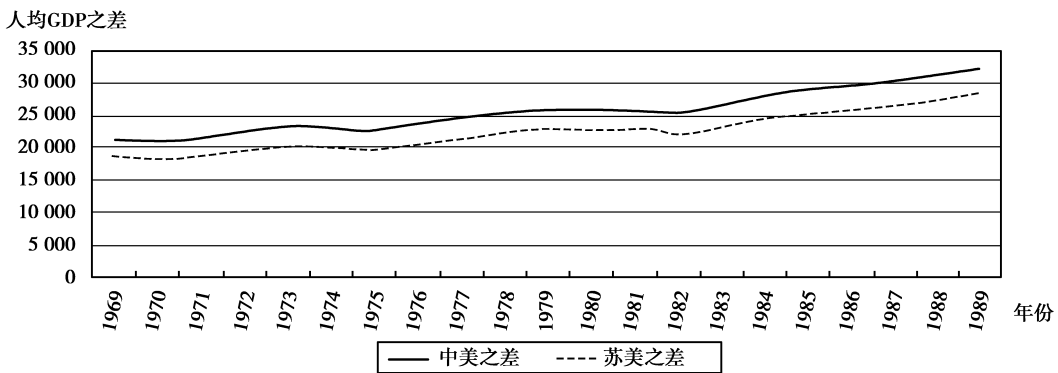
元，苏联为 7 112 美元，美国为 23 059 美元，差距依然较大。事实上，从 1820 年以来，美国的人均 GDP 一直大大高于苏联和中国（图 3），这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化要早于苏联和中国，苏联和中国一直都处于工业化的追赶过程中，也可以说“后发优势”一直存在。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与美国和苏联与美国之间的人均 GDP 之差来看中苏两国“后发优势”的一致性。从图 4 中可以看出，1978 年中国与美国的人均 GDP 之差（25 673 美元）还没有 1989 年苏联与美国的人均 GDP 之差（28 500 美元）大。由此看来，中国的人均 GDP 确实低于苏联，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以美国作为比较对象，苏联与中国一样也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



注：人均 GDP 的单位为 1990 Int. GKMYM。

数据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Copyright Angus Maddison)

图 3 1820—1989 年中国、苏联与美国的人均 GDP



注：人均 GDP 的单位为 2 005 年美元。

数据来源：ERS/USDA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Data Set。

图 4 1969—1989 年中国、苏联与美国人均 GDP 之差

<sup>①</sup> 人均 GDP 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力水平，实际上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 GDP 与发达国家人均 GDP 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



## 2.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比较

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可以衡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而也可以度量“后发优势”。中国与苏联(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尽管绝对数字不同。比如,1980年,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30%)高于苏联(16%),而工业所占比重(48%)低于苏联(62%);1990年,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41%)略低于俄罗斯联邦(48%),而农业的占比依然高于俄罗斯10个百分点。但从全球的视角看,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不是高收入国家的结构,中国的产业结构属于低收入国家的产业

结构范畴,而苏联具备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这与人均GDP水平刚好是相对应的。与美国相比,中国和苏联的产业结构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先是农业占比不断下降,工业占比不断上升,到了一定水平之后,第三产业的占比则显著上升。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服务业占比较大,而农业占比较小,美国的产业结构符合这种特征。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在产业结构上相差较大,苏联(俄罗斯)与美国的差距虽然小于中国,但提升空间也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无疑具有“后发优势”,但苏联(俄罗斯)的“后发优势”实际上也是不小的。

表2 转型时期中国、苏联(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产业结构/%

	1980年			1990年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苏联(俄罗斯联邦)	16	62	22	17	48	35
中国	30	48	22	27	41	32
美国	3	34	64	2	28	70

注:苏联为1979年数据,1990年数据为俄罗斯联邦数据。

资料来源:1979年苏联数据来自于上海财经学院的《外国经济参考资料》1983年第3期第37~38页;其他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的“专题指标:经济与增长部分”,网址为:<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AGR.TOTL.ZS/countries>。

从就业结构上看(表3),中国的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农业,而在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口较少。苏联(俄罗斯)的就业结构与美国就业结构的相近程度大于中国。比如,1980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而苏联为20%,美国为3%;工业的就业比重更为相似,苏联为38%,美国为30%,而中国只有18%。1990年时,情况有所改观,但结构

上的特征并没有改变。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国的人口总数比苏联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尽管苏联(俄罗斯)与美国在就业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意味苏联的就业结构没有改善空间,事实上,按照美国的标准,苏联(俄罗斯)的服务业的就业比重需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的就业比重需要进一步降低<sup>①</sup>,而这种变动实际上也意味着“后发优势”。

表3 转型时期中国、苏联(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就业结构/%

	1980年			1990年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苏联(俄罗斯联邦)	20	38	42	18	38	44
中国	69	18	13	60	21	19
美国	3	30	67	3	26	71

注:苏联为1979年数据,1990年数据为俄罗斯联邦数据。

资料来源:苏联(俄罗斯联邦)的数据根据张塞主编的《国际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336页数据计算;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的《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的表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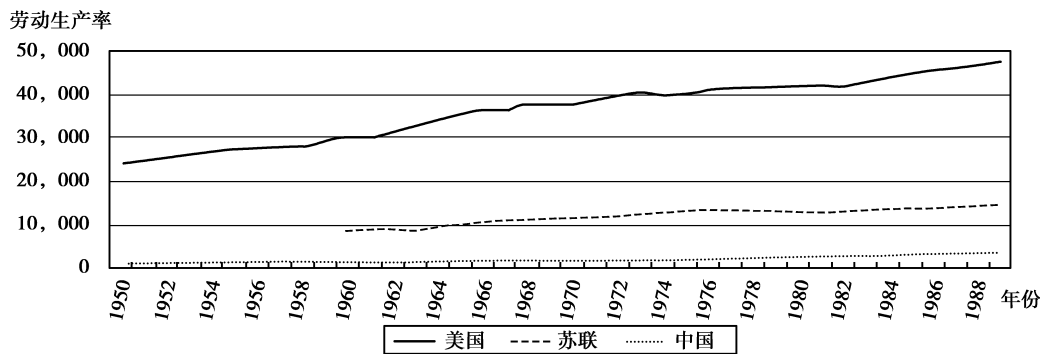
<sup>①</sup> 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在一、二、三次产业中的配置,表现出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再由第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转移的趋势。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的人均收入存在着差异。这一规律被称为“配第一-拉克定理”(Petty—Clark law)。

### 3. 技术水平比较

我们用多重指标来综合反映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首先用劳动生产率加以衡量。劳动生产率代表了劳动的生产效率,应用先进机器的劳动可以得到更多的 GDP,因此劳动生产率可以从某一侧面反映技术水平。从图 5 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一直高于中国,但是也一直大大低于美国。而且,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差不

多是中国和苏联之间差距的 3 倍。从这一角度看,苏联的“后发优势”空间也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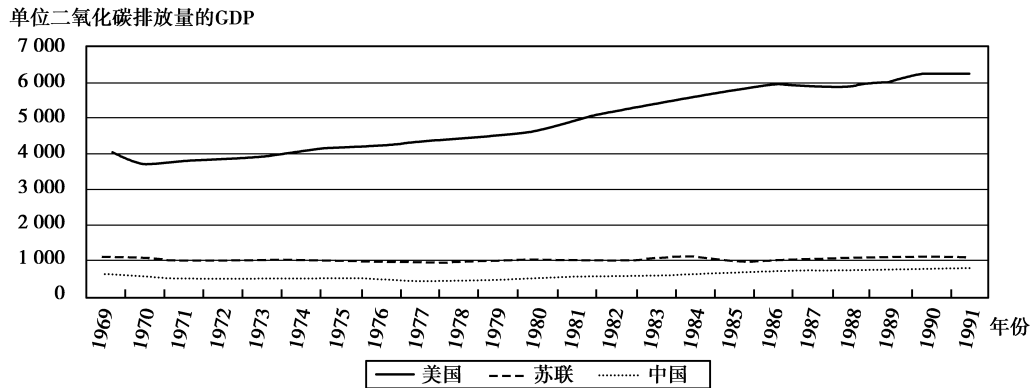
我们在这里还用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GDP 来衡量技术水平(图 6)。从这个指标上看,中国和苏联的单位 GDP 能耗都是很大的,而美国相比之下要好很多。也就是说美国用较少的二氧化碳生产了较多的 GDP。当然,中国的单位 GDP 能耗要大于苏联,这说明苏联的技术水平好于中国,但两者都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足以构成雄厚的“后发优势”。



注:劳动生产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and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January 2007, <http://www.ggdc.net>

图 5 1950—1989 年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GDP 的数据来源于 ERS/USDA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Data Set;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来源于 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

图 6 1969—1991 年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GDP/美元/公吨

为了说明中国、苏联(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科技差距,本文还选择专利和科技期刊文章数量以及互联

网用户及高科技出口情况来反映不同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上的差异(见表 4、表 5)。从这些指标上看<sup>①</sup>,俄

<sup>①</sup> 这些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但是遗憾的是没有苏联的数据,只有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的数据,尽管这不足以准确反映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但是由于俄罗斯承继了苏联的大部分科技力量,因此,这种比较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罗斯的技术创新能力要高于中国,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创新能力都大大低于美国,这些差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代表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的“后发优势”。

表 4 1989—1993 年中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专利和科技期刊文章数量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专利申请量:居民					
中国	4 749	5 832	7 372	10 022	12 084
俄罗斯联邦			906	39 494	28 503
美国	82 370	90 643	87 955	92 425	99 955
专利申请量:非居民					
中国	4 910	4 305	4 051	4 387	7 534
俄罗斯联邦			297	11 850	3 974
美国	76 337	80 520	84 160	90 922	84 241
科技期刊文章					
中国	5 411	6 285	6 186	6 956	7 566
俄罗斯联邦				817	19,659
美国	187 224	191 559	194 015	198 864	197 397

注:科技期刊的文章是指在上述领域出版的科学和工程类文章;物理、生物、化学、数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研究、工程和技术以及地球和空间科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1990—1998 年中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互联网用户及高科技出口情况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互联网用户/人/每 100 人									
中国	0			0	0	0	0	0	0.2
俄罗斯联邦	0		0	0	0.1	0.1	0.3	0.5	0.8
美国	0.8	1.2	1.7	2.3	4.9	9.2	16.4	21.6	30.1
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例/%									
中国					8	10	12	13	15
俄罗斯联邦							10	9	12
美国					31	30	31	32	33

注:高科技产品是指具有高研发强度的产品,例如航空航天、计算机、医药、科学仪器、电气机械等。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 三、中国与苏联“后发优势”实现条件比较

“后发优势”仅仅是表明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但要把潜力变成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这个国家所具备的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即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所形成的技术能力以及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Abramovitz,

1979),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与其说是处于一般性的落后状态,不如说是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Abramovitz,1986)。

#### 1. 技术能力比较

我们用教育水平以及科技人员的数量来衡量中

国和苏联(俄罗斯)的技术能力。从教育上看,苏联(俄罗斯)的教育水平总体上要高于中国,即人口素质总体上要高于中国。1980年,中国只有1.7%的相应年龄人口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而苏联为46.1%,与美国的55.5%差距不是很大;1993年,中国的水平虽然有提高(3.8%),但仍然低于俄罗斯。中国在接受中学教育方面的差距要小一些,但仍远不及苏联(俄罗斯)。只有在小学教育水平上,中国与苏联和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即所有适龄人口都接受了小学教育(表6)。而且,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据估计,文化大革命损失了200万中等水平技术人员和100万大学毕业生(World Bank,1981)。

苏联拥有比中国多得多的科技人员。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每1000人中有66位科学家和62位工程师,这一数字甚至高于美国(Bergson et al,

1983)。中国科技专家的数量有限,比如在化学和机械制造业,科技专家占生产部门总人力的比例只有4.5%,而巴西是5.2%,美国是21.1%。除了大量的高素质的科学工作者,苏联还有大量具有现代化意识的科技培训工作者。以农村为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农村有140万“高水平 and 中等水平的农业专家”和420万司机和农用机器的修理工(李仁峰,1981),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2%,文盲劳动力的比重微乎其微。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受到高水平专业教育的人口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仅仅为0.05%,只有8.8%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过高中教育,有21%的农村劳动力是完全文盲(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1985)。

因此,中国的技术能力远不如苏联,对于实现“后发优势”来说,中国的技术条件并不有利。

表6 中国、苏联(俄罗斯)和美国的教育比较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登记比率(占官方统计适宜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百分比)						
中国	1.7	2.9	2.9	2.9	3.0	3.8
苏联/俄罗斯	46.1	54.2	52.1	50.2	46.7	44.9
美国	55.5	60.2	75.2	80.0	81.6	81.1
中学入学登记比率(占官方统计适宜接受中学教育人口百分比)						
中国	46.0	40.0	49.0	53.0	56.0	57.0
苏联/俄罗斯	95.7	96.8	93.3	91.1	88.4	87.0
美国	91.2	97.3	93.1	94.5	97.3	98.5
小学入学登记比率(占官方统计适宜接受小学教育人口百分比)						
中国	113.0	123.0	125.0	122.0	119.0	117.0
苏联/俄罗斯	102.0	103.6	109.2	109.1	107.8	105.6
美国	99.3	99.1	102.3	101.9	101.5	101.0

数据来源: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2. 制度体制及经济结构比较

我们认为,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制度演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来源于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运用计划经济体制来完成工业化任务,而且实施了相同的工业化战略,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让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苏联经济结构的特点是重工业重、轻工业轻,农业相对落后;中国实际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1949—197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1倍多,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7.6倍,轻工业增长了21.8倍,而农业只增长了2.7倍(张永庆,1983)。

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两个国家都是国有经济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职工工资是由国家确定的,企业盈



亏也是国家负责,企业没有真正的自主权,不是独立的行为主体。中国虽然探索过企业的管理问题,但企业始终都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独立行为主体。

从工业组织形式和结构上看,特大型企业(雇员超过5 000名)在两个国家的工业部门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和苏联,大约有1 000个特大型企业雇用了1 200万~1 400万名工人,这些特大型企业的资产总值大约占工业固定资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其总产

值也大约占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见表7)。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特大企业扩展到大型企业,那么这两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仍然是相似的。在这两个国家里,从固定资产规模来看,雇员超过1 000人的企业占据着行业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大约有67%的固定资产属于大型企业,苏联这一数字则为81%。在中国,大型企业生产48%的工业总产值,而苏联是75%(见表8)。

表7 中国和苏联工业行业中的特大企业(雇员超过5 000名)

	企业数量	雇员		固定资产占比 /%	工业总产值占比 /%	雇员数量/企业数量 /千
		数量/百万	占比/%			
苏联(1983)	1316	14.4	38.1	46.7	35.9	10.9
中国(1987)	885	11.9	16.8	33.9	18.9	13.4

资料来源:陆南泉、张础和陈义初等编的《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45和436页,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编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93页。

表8 基于企业规模的中国(1987年)和苏联(1983年)工业集中度/%

企业规模 (员工数量)	企业数量		员工数量		固定资产		工业总产值	
	中国	苏联	中国	苏联	中国	苏联	中国	苏联
100人以下	68.5	27.2	14.0	1.6	5.3	1.1	9.6	1.9
100~500人	25.6	42.4	32.6	12.6	16.3	8.8	26.7	12.8
500~1 000人	3.6	13.1	14.7	11.2	11.0	9.0	15.5	10.8
1 000~10 000人	2.2	16.3	27.6	52.4	44.3	51.8	36.6	54.1
超过10 000人	0.1	1.0	11.2	22.2	23.1	29.3	11.7	20.4

资料来源:陆南泉、张础和陈义初等编的《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编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93页。

另外,在这两个国家,大型企业的垂直一体化水平都很高。比如在制造业中的几乎所有企业都自己生产铁和钢,而非从专业供给者那里购买。苏联仅有不足20%的生铁和钢是从专业供应者那里购买的,与之相比,美国这一比例超过了80%(Granick,1967)。而且,很大比例的备件和机器在两国也都是由大企业内部生产的,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

两个国家发展农业的组织模式具有相似性。苏联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国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1977年,苏联有国营农场2万多个,集体农庄2.71万个;国营农场的农业

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4.7%,集体农庄占37.7%,其余是私人经济(世界经济研究所,1980)。中国也有一些国营农场,但主要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有生产队,生产大队之上还有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体制一直延续到1982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数量也大体保持稳定。在这两个国家,农民都缺乏农业种植的决策权,也没有参与市场的激励,因为两个国家都对农业实施了统购政策,以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

### 3. 企业家文化比较

从企业家文化传统上看,中国与苏联(俄罗斯)

也难分伯仲。中国在宋代就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拥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结构；明清之际，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不利，但这段时期并不长。而俄罗斯的图景似乎不那么有利：直到 15 世纪中叶，受限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俄罗斯的市场并不是很发达；到 1914 年，资本主义发展才“仅仅触摸到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边缘。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区域内的和南方的零星的工业企业顶多是巨大的农业‘海洋’中的工业‘孤岛’”（Dobb, 1966）<sup>①</sup>。在此基础上，苏联经历了将近 60 年的反资本主义的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

对于中国来说，集体化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让私有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这无疑给人们套上了精神枷锁，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要解放思想。与中国相比，苏联没有对私有部门进行攻击。据估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有 30%~40% 的个人收入来源于私有部门。事实上，由于短缺的无处不在，苏联的普通民众在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时更具有企业家精神。因此，很难说中国在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方面比苏联拥有更大的先天能力。

#### 4. 地缘环境比较

我们把“后发优势”实现条件向外扩展，分析地缘环境对中国和苏联的影响。确实，中国靠近当时（转型时期）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包括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四小虎”（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还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大规模贸易盈余和汇率升值，渴望到劳动力成本低、制造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去投资。因此，中国成为资本转移的最大受益者。相比之下，苏联的经济中心位于欧洲的边缘。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欧洲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其增长率要逊色于东亚国家，因此苏联不能从中受益。

然而，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在东亚之上的，贸易规模也很大，尽管其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而且，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来说，地缘影响应该越来越小。因为就大多数的商品贸易而言，一旦通过集装箱装船运输，距离对运输成本的影响不是很大；而地缘对资本流动的约束就更小了。确实，与苏联相比，中国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海外华人掌握了大量的资本；但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会有海外侨民，而且资本本身并不爱国，资本流动的根本动因是逐利。实际上，在转型伊始，苏联也有潜力吸引投资。苏联经济的核心——乌拉尔山脉以西，本质上是欧洲的一部分，而 1992 年，欧洲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因此，从地缘来看，中国和苏联也是各有优势的。

#### 四、结语：“后发优势”潜力与现实经济绩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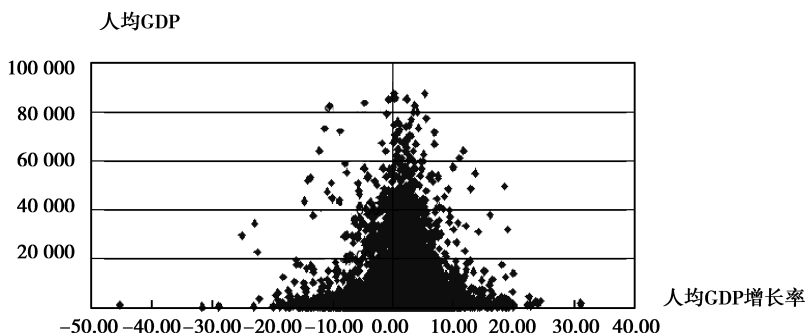
具有“后发优势”潜力，并且具有一定的实现条件，并不意味着好的经济绩效。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人均 GDP 水平低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尽管人均 GDP 不高，但也没有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即没有发挥出“后发优势”。我们根据世界上 192 个国家在 1970—2013 年的人均 GDP 和人均 GDP 增长率的数据（剔除了个别异常值）绘制了图 7。从该图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低既有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也有可能导致大幅度倒退。而人均 GDP 水平高的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率相对较小，无论是增长还是衰退。这说明，“后发优势”仅仅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可以说，经济实现增长，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客观条件（“初始条件”），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主观行为（发展路径和政策的选择）。当然，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区分转型国家和非转型国家。转型国家的政策相比非转型国家可能更为重要，但是非转型国家的经济发

<sup>①</sup> 然而，新的研究认为（Gatrell, 1986），在 1860 年之前，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比我们曾经所认为的更为发达。到 19 世纪后期，俄罗斯工商业活动的几个主要中心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莫斯科地区是这些中心中最古老的，它是传统的冶金工业中心，是随着蒙古时期莫斯科公国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圣彼得堡是现代化进入最快的地区。“到了旧体制的最后十年，圣彼得堡可能已经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城市’的一个早期代表……圣彼得堡的企业家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世界贸易之中，而且也着力发展高度集中的工业，这些工业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公司组织和复杂的技术。”（Blackwell, 1983）

展同样离不开适宜的路径和政策。因此,也可以把所有国家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初始条件”和“路径选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人均 GDP 高于中国,其人均 GDP 增长率低于中国符合图 7 的规律。但是事实上,苏联转轨之后差不多连续十年都是经济衰退,即经济为负增长(图 1),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我们知道,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苏联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才导致现实产生的这个结果。中国做对了什么呢?我们认为那就是选择了正确的转型道路,采取了适宜的改革政策。按照我们的论证逻辑,中国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因为人均 GDP 水平较低,但同时,苏联在转

型时期也具有“后发优势”(我们以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后发优势”仅代表一种经济增长的潜力,有这个潜力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实现。从而实现“后发优势”的条件看,苏联还优于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的“初始条件”区别并不大。如果我们的结果是可靠的,那么,苏联和中国在经济绩效上的差距只能用转型路径和政策来加以解释。这种看法实际上得到了俄罗斯的学者的呼应,比如阿·布坚科等(1996)就认为:“起因不在客观情况,因为两国的‘初始条件’条件是相似的,而在于主观因素,在于当局的政策,在于中俄两国改革派理解本国国情并在寻找走出困境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能力的不同。”



注:人均 GDP 的单位为 2005 年美元。

数据来源:ERS/USDA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Data Set

图 7 人均 GDP 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市场化转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转型路径、实施了适宜的改革政策,而不是“初始条件”所带来的“后发优势”潜力。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而只是强调“后发优势”并不是中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中国为什么能够选择正确的转型路径、实施适宜的改革政策,这一选择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到了经济绩效,等等,还需要在进一步研究中加以说明和讨论。中国能够选择正确的转型路径、实施适宜的改革政策是不是历史决定的?或者说苏联实施“休克疗法”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又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如果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进行历史的跨期比较也是一个较难的课题,如何让两个国家具有可比性,如何让比较分析框架能

够排除更多的“遗漏变量”,还需要进一步搜集更多的数据,采用更先进的方法来进行论证。

参考文献:

阿·布坚科,苏晓.1996.四条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J].国际社会与经济(10):27-29.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1985.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32.  
 李仁峰.1981.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农业出版社:第 498-499.  
 林毅夫.200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J].经济学(季刊)(4):989-1004.  
 罗澜.2012.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济研究所.1980.世界经济年鉴:1979[DB].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63-264.  
 张永庆.1983.谈谈国民经济发展速度[M].西宁:宁夏人民出版社

- 版社：22.
- ABRAMOVITZ M. 1979. Rapid Growth Potential and its Realiza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 Postwar Period[M]// MALINVAUD E.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London:1-30.
- ABRAMOVITZ.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6(2): 385-406.
- BERGSON A, LEVINE H S.1983. The Soviet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M]. London,Boston;G. Allen & Unwin:55.
- BLACKWELL W. 1983. The Russian Entrepreneur in the Tsarist period:An overview[M]. Guroff and Kasterson:17.
- DOBB M.1966.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M].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35-36.
- GATRELL P W. 1986. The Tsarist Economy, 1850—1917[M]. London;Batsford:144-150.
- GRANICK D. 1967. Soviet metal-fabricat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e versus policy [ M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UCHS J,WOO WT.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J]. Economic Policy,19(18).
- WORLD BANK. 1981. China: Socialist development [ R ]. Washington,DC:106.

## Does “Initial Condition” or “Path Selection”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A Research on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Based on “Latecomer Advantages” Theory

SUI Fu-min

(*Economic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of China and Soviet Union has chosen different paths and their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largely different. Then, does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transition effect mainly emanate from the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 for their transition or from different selected paths and policies for the transition? Based on “latecomer advantage” theory, by using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framework,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itial condition” for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ucture and system formed by the history and strategy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at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at there is not big difference in “the initial condition”, that both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China have “latecomer advantage”. Furthermore, former Soviet Union has better realization condition for “the latecomer advantage”, but former Soviet Union does not bring her “latecomer advantage” into fully play.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does not mainly depend on “the initial condition” for the transition but rely on “the path selection” for the transition. The success in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of China should be chiefly owed to the selection of proper transition path and suitable reform policies.

**Key words:**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latecomer advantage; initial condition; transition path; path selection; reform policy;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progressive reform; shock therapy

**CLC number:** F061.3; F064.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4)06-0069-12

(编辑:夏冬)